

New Farm Economics

John Ikerd

一种充满希望的经济学——可持续农业经济学

[美] 约翰·艾克 张果译

产业化农业使农民走向破产

我曾经在三所不同的美国大学以各种校内课程和进修课程的形式教授过农业经济学的传统原理，时间长达 15 至 20 年。我教授过农场经营、市场营销、财政学、农业政策及其他一些课程，致力于帮助农民从有限的经济资源中获取最大利润。但是，在过去的 10 到 15 年中，我所教授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农场经营。我学习并教授的是可持续农业经济学原理——即关于可持续性的经济学。这种研究转向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无从可查，因为它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随时间流逝逐渐形成的。对我本人来说，这种转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场经济危机。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作为教授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教师，我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在诱发这种危机而非预防它。因此，我无法提供给农民有效的应对方案。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财务问题，我们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农业经济学方法。

传统农业经济学强调利润最大化。其潜台词是利润越多，生活的经济水平就越高；而生活的经济水平越高，满意度就越高，生活质量也越高。

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率，所导致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最佳“途径”的一个相当狭隘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生活质量最大化最佳“途径”的狭隘前提，尽管我早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农业利润的追求将农民推向一种农业的产业化模式。这种产业化提高了农业效率，却降低了许多农民的生活质量——既包括那些被迫破产的农民也包括许多继续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产业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农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食品安全与品质，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场经济危机中，我开始意识到农场经营的产业化方法正使农民走向破产。今天，农民、乡下居民和整个社会都期待着能有一种更富有社会责任感、更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经济可行性的农业系统。这是当人类文明步入 21 世纪时农业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帮助农民建立一种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未来的农场必须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不管对农民、消费者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是这样。靠剥削土地或剥削他人的方法是不可能维持农业的盈利能力的。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农场必须节约并保护自然资源，因为从长远来看，必须依靠这些资源来提高生产力。同时农场也必须向经营农场的家庭及乡下居民提供更高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并向整个社会提供充足的健康安全的食品和纺织品。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需要一种全新的农业经济学方法。

一种全新的农业经济学方法：可持续农业经济学

可持续农业经济学的第一个原则是对“启蒙了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这种自我利益认识到了自我的个体维度、人际维度和精神维度。这一原则几乎在所有最流行的“后工业”农场经营方法中都有体现，包括整体资源管理、生物动力学农业、永久性农业以及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的三个基础——经济可行性、社会责任性和生态完整性——恰恰反映了我们生活质量的个体维度、人际维度和精神

维度。整体管理的目标由三部分组成——生产形式、生活质量，以及未来前景——这正好是以另一种方式描述了可持续性的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和生态维度。真正的生态农业既是一种生活哲学又是一种农业方法——既是一种对社会和道德原则的表达又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所有这些农场经营的方法都平衡了经济目的、社会目的和生态目的，其总体目的是通过协调和平衡经济、生态和社会，而非通过最大化或最小化某方面，来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可持续农业经济学的第二个原则是采取“一种整体的农场经营方法”。我们并不使用分析的方法把农场一部分一部分地分解，而把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的整体。在可持续性的农场经营中，农场各组成成分间的关系与这些成分自身同样重要。传统的活动分析趋向于忽略或至少是歪曲了积极关系对作为整体的农场经济状况的贡献。例如，当分离地评估轮种制中的个别庄稼时，当脱离庄稼单独地评估牲畜的饲养时，我们便往往低估或忽略了种植不同庄稼和饲养多种牲畜之间积极的相互联系，这些积极联系可以表现在对付害虫、保持土壤活力与肥力、有效使用可用劳力、分散风险等各个方面。

整体经营要求必须以所发生的变化对整个农场系统经济状况的影响来评估这些变化对某项或某几项活动的潜在影响，每一种农场经营的“后工业”方法都提倡使用整体农场这一经营手段，虽然具体途径略有不同，但都实现了相同的基本目标——他们把农场看做一个整体而非活动的集合体。一个根本问题是：怎样才能将农场最佳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即怎样才能实现有效结合的整体农场系统而非去追问如何挑选出单项活动的最佳集合体。整体经营是通过协同合作获得生产力——即整体力量大于其组成部分的力量之和。

进行整体农场评估的一个基本方法与传统农场经营中的“部分预算”关系密切。在部分预算中，评估某项具体计划或活动所发生的变化，需要估算这种变化对农场总体经营的潜在影响。它之所以被称为“部分预算”是因为只对农场中那些将会受到这种变化影响的部分进行预算。首先，从某项新活动中获得的预期收入增加额会被添加到其他活动中任何一种预期成本减少额中去，而这将被认为是这种新活动所带来的结果。其次，与这种新活动相关的预期开支增加额会被添加到与这种新活动相关的其他活动中的任何一种预期收入减少额中去。最后，成本增加额和收入减少额的总和会从收入的预期增加额和成本的预期减少额中扣除，从而得出整体农场收入的净差额，该净差额即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如果这种过程被仔细实施，所得出的结果应该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合理的评估，用以评价如果改变农场经营的某一部分，会对整个农场系统造成何种经济后果。这个过程也能用于评估如果改变某项农场活动的某一方面，会导致何种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制定预算必须将无形事物包括在内，例如可用于家庭活动和社区活动上的时间数量和时间质量。部分预算还能用于估算农场整体经营所发生的变化对环境管理的潜在影响——土壤流失、水质、生物多样性等。这种方法必须将家庭，或个人务农活动看作是农业总体系统的一部分。为了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家庭劳动和管理、时间的选择使用、伦理道德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在农业上的表现最终都必须与农业经济状况平衡起来。

可持续农业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则是“通过多样性获得力量”。在建立既持久又富于生产力的生态系统时，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产业系统更看重生产力而非持久性。

日益增强的专门化损害了生物多样性，因而使牲畜和植物在面对昆虫、寄生虫、疾病和其他有害物以及不利的生长条件时变得更加脆弱——越来越依赖于昂

贵的、来自于农场外部的输入品。日益增强的专门化也会损害经济多样性，因而使我们难以承受市场价格的下落或某种输入品成本的上升——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风险管理策略或合同农业。农民几乎总是发现他们缺少所需要的经验或市场训练来运用商品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农民也总是发现，他们在与大公司“谈判”综合性生产合同时处于竞争劣势。农民完全不能有效地应对大规模专业化农场经营的各种风险。

但是，通过运用多样性的基本原理，生产、市场营销和财务风险都能被应付过去。在管理生物多样性时，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包括挑选庄稼和牲畜的组合——空间上、顺序上以及时间上的组合——以便破坏有害物的出现周期或控制有害物的数量、保持土壤活力与肥力，以及有效利用可获取的所有资源。依赖多样性而非来自于农场外部的输入品来保持生产力，农民就能减少现金支出成本和可变成本。然而，多样化的系统需要更多的劳力和管理——本质上即是固定成本。因此，当农民用劳力与管理代替农场外的输入品时，相对于可变成本的固定成本就会增加。

甚至，即使是总成本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农民如果较少地购买农场外部的输入品而较多地依赖农场内部的自有资源，就能极大地减少他们的财务风险。在这样的农场中，大部分因恶劣天气或不良市场条件所导致的短期损失都能通过减少困难年份的劳力和管理支出而被化解。另一方面，不管农场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利润，农民都必须支付购买的输入品的成本。因此，与输入成本低、固定成本高的农场相比，那些输入成本高、可变成本高的农场在面对经济衰退的风险时表现得更加脆弱。

在管理经济多样性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要挑选活动的组合，这些活动往往能抵消市场价格。如果商品能抵消市场价格，它往往能稳定农场收入，因为从一种商品中获得的利润往往能弥补在另一种商品上的损失。甚至如果那些商品所具有的价格模式毫不相干或并没有相互联系，它们也能增加经济多样性。例如，一家农场从事四种相同规模的农业活动，这些活动的价格模式彼此毫不相关，其可变性都相等。那么，与另一家规模相同却只专门从事这四种农业活动中的其中之一农场相比，第一家农场的收入只是后者的一半。但是，多样性并不等于多个品种。如果不同的农业活动具有相同的基本生产模式和市场模式，例如种植玉米和大豆，这种意义上的多个品种对减少风险就没什么用。可持续农业经济学需要的是有效综合的、具有经济多样性的农业系统。

可持续农业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是“给予顾客全部的经济价值。”在被大型农业公司控制的全球市场上，如果只销售无差别的农产品，例如玉米、生猪、牛、或小麦，农场是无法维持盈利能力的。提供给顾客的食品或纺织品必须区别于他们在超市或百货公司里所能找到的那些商品，也需要具有比那些商品更高的价值，这样才能有持续的利润。这也许是可持续农业经济学最困难的方面，因为这是与传统的农场经营相比最大的不同点。然而，农业的公司化已经导致单个的农民在今天的农业中无法参与竞争，即使他们在价格和质量上都具有竞争力。这些农业公司在市场上具有足够的力量，因此可以拒绝那些不愿签订综合性生产合同、不满足于地主与契约工人这种角色的农民进入市场。这不再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是一个市场实力的问题。

今天的消费者每挣一美元，就只花一毛钱在食品上，而从这一毛钱中农民能留下的还不到一分钱。食品加工、运输、包装、做广告以及其他的市场服务花去了八分钱。另外一分钱花在购买来自于农场外部的输入品上。但是，今天的食品

必须是大量生产且大量上市的，这样它们才能进入超市，才能实现产业化食品生产的经济规模。结果，今天超市里的大部分食品之所以能被选中而进入市场，都是因为它们适合机器收割、适合高效加工、适合运输以及适合长期保存，而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更好的口感、更新鲜或更高的营养。另外，大量生产的食品必须符合“最普通”消费者的口味。大量生产所节约的经济开销来自于标准化而非多样性。但是，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口味和偏好，因此我们所重视的东西也便不同。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必须向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更多他们最重视的东西。

产业化农业的弱点为农民发展可持续市场提供了机遇，这种市场对保持他们农业活动的盈利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在本地市场上，直接将产品卖给消费者的农民有机会根据口感、新鲜度、健康度和营养性，而非加工、运输和储存期限等要素，来选择种植的庄稼种类和饲养的牲畜品种。他们能在产品质量最高的时候进行收获，将新鲜的产品投入市场并卖给本地消费者。产业化的生产系统并不能复制这些优点，因此本地农民便有了可持续市场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能够基于他们对社会责任和生态完整的义务而将产品投放市场。许多消费者确实很关心诸如自己所吃的食物来自何方，农民如何对待土地和提供动物的动物，以及农民是否承诺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等问题。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人都愿意为那些以他们认为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方法生产出的食品支付额外的费用。产业组织也许会提出关于可持续性的主张，但产业范式完全不能达到可持续性的社会标准和生态标准。可持续农业需要一种不同的市场营销——它以合理的代价给予消费者更多的价值。

也许，经济可持续性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同样也是对农民最大的潜在回报。为了维持农场的盈利能力，农民必须发展他们自身与顾客之间有意义的关系。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必须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他们必须致力于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协同工作，因为他们都非常关心彼此。他们并不必将这种关系仅仅局限于本地居民，但他们必须把他们的顾客视为真实的人而不是非人的市场。人能够和身处于世界另一端的其他人建立联系，但农业公司却不能与任何人建立联系，因为公司本身并不是人。有意义的关系不能是大量生产的，因此它们也就不能是产业化的。

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如果要通过农业获得更令人满意的人际生活质量，农民及其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通过分摊各自对管理自然环境的义务，农民及其消费者就能互相帮助，最终过上一种更有目的和更有意义的生活。

这种农业经济学不同于我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教授给农民的经济学。但是，这种经济学显然更有意义得多。它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还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农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它确实是一种应用于务农和生活的更好方法。我们并不能保证这种农业经济学对任一特定农民、或普遍意义上的农民都有效。但是，与产业化的经济学相比，它确实能为未来的农业带来更多的希望。可持续农业经济学正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经济。

*作者约翰·艾克(John Ikerd)为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译者张果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转自《世界文化论坛》总第 37 期

Website:http://www.postmodernchina.org/cgi/show_item_articlelist.php?item=magazine&item_article_id=77